

徐向前入党： 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

□ 卫惠贤



1925年8月，广州正是炎热的夏季，徐向前和白龙亭、孔兆林几位老乡，登上了广州北上的列车。一年以前，他们从上海乘轮船刚到广州，人生地不熟，言语不通，还有一年四季的小蚊子咬人，几乎把他们这些北方佬吓跑。黄埔岛的新生活，征战中的枪炮声，改变不了他们的习惯，总是希望走向北方。徐向前和几位老乡，要走去河南国民二军工作。

一踏进国民二军营，徐向前就感觉异常。表面上这支国民二军打着青天白日旗帜，号称革命军，实际上是换汤不换药，北洋军阀部队的习气，作风根本未变。第六混成旅旅长弓福魁，是个山西人，对徐向前这位黄埔出来的老乡，倒也有几分尊敬。不久，徐向前被调为旅部参谋；之后，又升任为第二团团副。徐向前开始挺高兴，谁想团副这个职务有名无实，没有指挥权，不参不谋，等于吃闲饭的。徐向前深感不安。

闲得无事，一天徐向前跑到安阳中学，和教员罗任一相识了。这位日本留学生、共产党员，认识徐向前这位来自黄埔的人，甚是高兴。徐向前也觉得和他一见如故。他们还一块去参加声援“五卅”运动的群众大会，听上海来的青年学生演说。徐向前还到六河沟煤矿工人中活动。他没忘记黄埔军校的任务，熟悉了工人，认识了有志青年，就向他们宣传黄埔军校，宣传三民主义、国民革命的道理。三个多月内，先后动员和介绍了十几名青年去广东投考黄埔军校。

1926年11月底，徐向前从上海乘船来到武汉。晚上下船，码头、街道到处是黑洞洞的，什么也看不清，他在汉口码头附近的一个小旅馆住下。第二天一早起身外出看看，顿时，感

到像步入一个新世界。到处贴着“打倒列强除军阀”“革命万岁”的标语；一队军人出操回来，高唱着“打倒列强，打倒列强”“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的战歌。听到这歌声，徐向前心花怒放。从一年多前离开广州，离开黄埔军校，再也没听过这样的歌声了。他精神振奋，早饭都没吃，又步行奔武昌。听说，那里有北伐军司令部。

一路走，一路看，过了汉江进入武昌，更是一派革命的景象。标语满目，群众游行，歌声震天。经过半天的奔走、询问，终于找到了学兵团，找到了正在筹建中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

在这里，他见到了许多黄埔同学，其中有蒋先云。在这里，他做了学兵团的一名指导员，不久又被任命为武汉军校总队政治大队第一队少校队长。武汉军校全称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在武汉三镇名声很响，几乎人人皆知，当时有“第二黄埔”之称。

1927年2月22日正式开学。这所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的传统，为中国革命培养着新军。徐向前既是队长，又做教员。经过在国民二军近一年的风风雨雨，徐向前回到革命军校，又唱起了“以血洒花，以校作家，卧薪尝胆，努力建设中华”的黄埔校歌。他走过曲折的道路，又走上康庄大道，走出苦闷、忧虑忡忡的生活，回到革命的大家庭。

武汉军校继承着黄埔军校传统，教练、教学、生活紧张活跃。主要课程分军事、政治。军事课有步兵操典、阵中要务令、射击教范等。政治课设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等。究竟是三民主义好，还是共产主义好？这是徐向前这时日思夜想的中心问题。形势所迫，他不想不行。以前在黄埔时他读过一些共产主义的书报，有点印象，但理解不深，也没认真思考过。经过几年的颠沛流离，耳闻目睹军阀混乱、国民党腐败等现象，使他不得不想。常来常往的一些共产党员，给了他很大的启示和帮助。他们大都是黄埔同学或山西老乡，又是活跃分子，如樊炳星、杨德魁、吴展、李楚白、贺昌、程子华等常在一起聚谈。人人都谈理想、谈志向，谈对人生和时局的看法，谈三民主义和共产主义、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区别，兴之所至，各抒己见。使他原来对共产主义和共产党的一些模糊认识，逐步得到了澄清。

从读书、交谈和争论中，徐向前的思想发生了飞跃；经过两年的曲折经历，他开始思考一个问题：谁能救中国，谁是真正的革命党？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这要他作出回答、作出决定。他不愿做“跨党分子”，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如今目睹军阀混战、百姓受难、国民党腐败，他认识到国民党不如共产党，三民主义不如共产主义。

武昌，是座具有革命光荣传统的英雄城，辛亥革命发源地。许多革命者的足迹，踏上过这片土地。孙中山、毛泽东、恽代英、周恩来、董必武等，都在这里发动和领导过武装起义和革命运动。徐向前在这里决定了他终生奋斗的目标。1927年3月，徐向前经共产党员樊炳星、杨德魁介绍，正式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武汉的局势，越来越紧张了。蒋介石在上海各地继续发动反共、“清党”高潮；原武汉国民政府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公开反叛后，联合四川军阀杨森进攻武汉。为了保卫武汉政府、惩罚叛军，武汉军校、南湖学兵团和武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师生，紧急编成“中央独立师”，在叶挺统一指挥下，星夜从武汉出师了。

徐向前率领学生军又踏上了征战的道路。这是他生平中第四次参加征战。他手下的学生兵，大多是入伍不久的新兵，只是班排长中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很多。战士们经过几个月的严格训练，也都表现出勇往直前的精神。徐向前本人，已经是身经多战的指挥官了，他对行军、宿营、侦察都有了一套经验。他按黄埔军东征的做法，路上领着队伍不断高唱“打倒列强，打倒列强”的战歌，不踏禾苗，不坏田产；每到宿营地，不扰民、不拉夫，买东西给钱、借东西送还。黄埔军校东征时周恩来倡导的政治工作，徐向前进一步的发扬。白天行军，他给大家讲革命理想、讲战术动作。学员们像野外演习一样，欢快地走了一程，又走一程。

5月16日，徐向前所率的学生军参战，在桃花镇将川军一部击溃。接着乘胜追击，又在柴阳、汀泗桥、通海口一线和川军第九师接上火。杨森这支队伍，打仗稀松，跑起来挺快，外号“川老鼠”。徐向前队中一名四川学生，在川军第九师当过兵，颇了解那支队伍的底细和战术，徐向前就让那位四川学生跟在身旁作“参谋”，抓住战机，穷追猛打。“川老鼠”像见了猫似的，逃得飞快。

徐向前手下的学生军，首次参战，连战皆捷。战报传来，叶挺的二十四师把叛军夏斗寅部队打垮。武汉政府又提出愿与叛军议和，保武汉的战事遂告结束。军校学生又回到武昌，这里一切都不平静。传说多，议论多。有人说，汪精卫武汉政府将“讨蒋”东征；有人说，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好；还有人说，共产党内发生了改组……

前途如何？战事如何？徐向前日思夜虑。不管发生什么事，他都决心跟共产党走，革命到底，像党章上写的：“共产党员要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5月底的一天，徐向前接到共产党组织的一个通知：速去开会。他怀着新奇的心情，走进蛇山西粮道街一个会场，只见周恩来正端坐在主席台上。他还是那么雄姿焕发，只是没穿军服。两年前在黄埔岛和在东征路上，徐向前多次见到这位军校政治部主任。他潇洒的风度、雄辩的口才，给徐向前留下难忘的印象。可是，今天的周恩来，态度十分严肃，他的目光审视着全场。他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讲了上海发生的“四一二”事件，讲了湖南长沙发生的“马日”事件，还讲到武汉当前的形势以及夏斗寅叛军的情况，要求同志们要认清大局，坚定信念。

这一天，是徐向前加入共产党后，参加的第一次党的会议。当时他只知道在武汉军校内有共产党的委员会，书记是陈毅；后来才知道，周恩来是5月下旬从上海秘密来到武汉的。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五次代表大会选出的中央政治局委员，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后改任军事部长）。徐向前这次的党员第一次聆听周恩来的报告。在《历史的回顾》中，徐向前写道：“入党我才知道恽代英、陈毅同志是军队的负责人。有天，我接到组织上的通知，去蛇山西面的粮道街中央机关开会。会议由孙永康主持，施存统讲了话，周恩来同志在会上作了关于政治形势的报告，提到了打夏斗寅的问题。这是我入党后第一次聆听重要政治报告。我为自己能够成为共产主义队伍中的一名战士，而感到自豪和光荣。”

（摘自1999年第9期《支部建设》，原标题为《为共产主义流尽最后一滴血——徐向前决心跟共产党革命到底》）

长征时期，中共中央机关警卫部队中央警卫团，有一位特殊的红军战士，谁也不知道他的身世，没有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更无人知晓他的出生年月……

大家只知道他是个聋哑人，在他的档案中姓名一栏填写的也是“哑巴”。战友们都知道，他是一位在平凡岗位上甘于为革命事业奉献一生的英雄。

大渡河畔参加红军。1935年五六月间，红军长征到达四川大渡河谷。由于不熟悉当地道路，作战任务紧急，急需找个带路的向导。红军侦察员四处寻找时，政治保卫大队的战士肖士杰发现了一个站在路旁并不躲闪的壮年汉子，因为不管问什么他都不作应答，好像只会“噢噢”地叫。红军指战员认为此人是在装聋作哑，怀疑他是敌人乔装的探子在刺探军情。考虑到中央领导人的安全和担心暴露部队的行动，红军指战员索性把这个人带回到部队控制了起来，并让他随部队走了一段路程。

经过两天的观察和考验，红军指战员发现此人的确又聋又哑，不是敌特奸细。于是决定让他离开部队，返回家乡。然而，此人却坚决不离开，坚决要跟着红军，并且主动帮助部队干重活累活。红军指战员多次劝说，此人大发脾气，他比划着告诉红军指战员：红军好，不想回去，想跟着红军一起走。

红军指战员也观察到，此人虽然是个聋哑人，但懂得善恶，特别是勤劳能干，不怕苦，具备了参加红军的基本觉悟和条件。红军在长征途中减员严重，也需要人员补充。再说这位聋哑人已经离开家乡一二百里了，并

长征路上的“哑巴”：军史特例，无名英雄

□ 陈宇

且不知道回家的路，更没有办法送他回去。于是，经领导批准，决定把这位聋哑人留下来，分配他的主要工作就是背行军锅、炊具。

这位聋哑人就这样走向了长征之路，成为一名红军战士，并跟着红军开始走上革命道路。这样一位在平常社会极为普通、甚至在人群中被边缘化了的人，汇入了红军队伍的滚滚洪流，从此开始了再不同于往日炊柴或背货的生活。

战斗工作在中共中央首长身边。政治保卫大队，是中共中央、中革军委在长征路上的贴身警卫部队，负责保卫全党和全军的“头脑”，因此被称为“铜头盔”部队。这支部队从一组建就主要担负着保卫中共中央首长的重大任务。1928年5月，井冈山会师后合编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4军，为保证军部和首长的安全，组建了军部特务连。1930年8月，红一方面军（又称中央红军）成立，朱德任总司令，毛泽东任总政委、总前委书记。特务连改称总前委特务连。10月，该连扩编为特务队。12月，又改称特务大队。1931年6月，改称国家政治保卫大队，隶属国家政治保卫处（后改为政治保卫局）领导。1934年7月，扩编为政治保卫团。10月，随中共中央、中革军委机关纵队踏上长征路。1935年2月“扎西

整编”，政治保卫团缩编为政治保卫大队，下辖3个队。大队长是时年还不满20岁的吴烈，他后来多年都是这位聋哑红军战士的直接领导。

这位聋哑的红军战士聪明能干，喂马、烧火、做饭样样都行，他加入红军队伍，领导就安排他到中央警备团炊事班工作。由此又机缘巧合地成为保卫中共中央、中革军委领导人的贴身警卫部队炊事班的一名挑夫，刚入伍就战斗、工作、生活在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中共中央领导人的身边。这位特殊战士由此也成为人民解放军历史上聋哑人参军的特例。

肩负100多斤的重担，爬雪山、过草地。聋哑人刚加入红军队伍不久，便迎来了爬雪山、过草地的艰苦行军。雪山草地之高寒地区，对于来自南方的红军指战员来说是身体上的极大考验，然而对生长在此地的聋哑人来说，困难就小得多了。正是这种机遇，使正当壮年的聋哑人初展其吃苦耐劳的能力和潜力，战友们很快对他有了比较深入的认识，彻底打消了原来的顾虑，也使他很快就融入革命大家庭中。

红军来到夹金山下，在缺衣少食、不可能有充分准备的情况下，开始翻越“连鸟儿也难以飞过”的大雪山。这位聋哑战士身着破烂的单衣，

满是血泡的脚上缠着干树皮，艰难地跟着部队行军。山顶空气稀薄，雪光刺眼。行军中最艰苦的是挑夫和炊事员，沉重的大铁锅压在他们身上，他们的心脏和肺部承受着比别人更大的压力。山陡路滑，每走一步，都有可能滑倒。

在半山腰，背行军锅的战士小李眼看着就要被狂风吹倒了，走在后面的聋哑战士立即用身体撑住他，拎过20多斤重的大锅扛在了自己背上，向山顶爬去。这位聋哑战士的背上本来就堆得如一座小山，连队的瓢盆水桶等炊具都在这里。大家的目光刹那间都聚焦在他的背上，不约而同地发出赞叹。更让人赞叹的是，此后长征路上，行军锅再也没有离开过他的背部。

这位聋哑战士背着行军锅等炊具，跟随红军翻越白雪皑皑的大雪山后再过茫茫沼泽草地。行军锅加上其他炊具，又组成一副100多斤重的担子，聋哑战士都抢过来挑在自己的肩膀上。一天到晚都是行军，有时还急行军。作为炊事班人员，他肩挑背扛，毫无怨言。

与这位聋哑战士一同走过长征路的杜泽洲多年后回忆说：“为了减轻战友的负担，哑巴又在肩上担起了100多斤重的担子，筐里放满了炊具和碗筷。他把牺牲了的同志身上的背包和



邓小平在瑞金 反腐败

1931年，邓小平任瑞金县委书记。在瑞金，邓小平采取种种措施，努力消除干部队伍中的腐败现象。一天，他面对一封群众检举信，气愤地拍起了桌子：“腐败，可恶，革命队伍中的败类！”那是检举揭发上任不久的县苏维埃政府主席黄正的一封群众来信，列举了大量事实，揭发黄正以权谋私，非法向工人摊派生活费，搜刮他们的钱财。

邓小平看完完全信后，派人立即查实上报。没多久，一份调查材料送到了邓小平那儿。“必须严肃处理，清除干部队伍里的腐败分子。”邓小平拿起笔，在材料上作了明确批示。

很快，在邓小平的组织下，有60多人参加的培训班在县城开办。百忙之中，邓小平多次到培训班给大家上课。他既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党的性质与宗旨、革命的形势与任务的教育，又反复强调要加强干部队伍的作风建设，努力做到廉洁奉公、遵纪守法、一尘不染、艰苦朴素。与此同时，对党员、干部的监督机制也得到加强。党性强、作风好的干部被充实到县委监察机构；县、区、乡以及基层单位普遍设立了举报箱；在集镇办起了黑板报，经常登载党员、干部在作风建设方面的正反典型。

邓小平率先垂范，带领党员、干部同腐败行为作不懈的斗争。

（摘自1993年第5期《党史纵横》，原标题为《1931年的瑞金县委书记邓小平——有胆 有识 有为》）

最小的“红军哥哥” 向轩

□ 覃章衡

被称为最小的“红军哥哥”的向轩，是贺龙元帅的外甥、“湘西双枪女英雄”贺满姑的儿子。

1926年3月，向轩出生在湖南省桑植县。1928年8月，因被出卖，贺满姑在突围中被捕。两岁多的向轩和哥哥、妹妹一同随母亲贺满姑被押往县城关进牢房。贺龙的大姐贺英知道消息后，托人将3个孩子从大牢里用重金赎回。贺满姑宁死不屈，走上刑场被敌人处决。从此，向轩便跟随贺英生活，喊贺英为妈妈。

“砰！砰砰！”1933年5月6日，天刚刚蒙蒙亮，鹤峰县洞长湾崎岖的山路上传来几声枪响。贺英带领的游击队遭遇袭击。战斗中，她腿部中了一枪，腹部中了两枪。这时，贺英将一个小包递送给向轩，里面有两个戒指、5块银圆、一把小手枪。贺英要他从后山的小路追赶游击队员，“去找红军，找大舅”。

小向轩拿着贺英妈妈给的小手枪，朝追来的国民党团防部队打了一

枪后，就往山上跑。自小在山里长大、熟悉地形的向轩躲过追捕，历尽千辛万苦，将贺英妈妈临终前托付的小包交到了大舅贺龙手上。新中国成立后，解放军总政治部和成都军区商定，向轩的年龄就从1933年5月6日（农历四月十二日）算起。这一天，向轩拿起贺英给他的枪参加战斗，年仅7岁，由此成为“中国最小的红军战士”。

1935年11月19日，中央红军长征一年之后，红二、六军团2.1万人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的率领下，从湖南省桑植县的刘家坪、瑞塔铺、县城等地出发，踏上漫漫征途。此时，9岁的向轩已是红二、六军团司令部通信班副班长。向轩后来回忆：“那时，我还是个孩子，站岗、放哨，调皮得很，最喜欢在那一块稻田里跑来跑去。”

随后，向轩随部队到了陕北，到了延安，进军大西南。在这些征程中，向轩身上26处负伤，右眼被打瞎，脖子、背、腰、膝盖、右脚等多处受伤，至今还有弹片留在体内。

（摘自2019年第3期《湘潮》）

帽，穿上了缀有红领章的灰色粗布军装。他激动地左看看右看看，前摸摸后摸摸，感觉特别亲切。可以看出他对革命前途充满了向往，并渐渐构筑起了坚强的信念。长征路上发给他的这个红五星帽徽和这枚红领章，后来成为他终生保存的极少物品之一，也成为他最宝贵的珍藏。

这位聋哑战士在长征路上不怕流汗受累，不怕艰难困苦，不怕流血牺牲，步步紧跟部队，一路追风走来。行军途中，不管生活多么艰苦，环境多么恶劣，情况多么危急，他肩挑100多斤重的担子，从未掉过队；部队刚到宿营地，他就忙着挑水做饭，积极为战友们服务。他跟随红军，历尽千辛万苦和千难万险，于1935年10月胜利到达陕北。

在红军部队中，他是一位极为普通的战士，甚至普通得在队伍中几乎看不到他的存在，但他又是一个身份极为特殊的聋哑战士。他不会说话，也听不见别人说话。他更不识字，甚至不懂哑语，只会用简单的手势表达自己的心思。然而，正是聋哑这一特点，加上革命大熔炉的锻炼和时代造就，让他成为中国工农红军长征历史上绝无仅有、富有传奇色彩的革命战士。

（摘自2018年11月6日《人民政协报》）

